“张骞传胡乐，李延年造新声”史料真伪考辨

毛贞磊

内容提要： 史载“张骞传胡乐，李延年创新声”。这一“历史事件”在学界被看作是中国音乐史上的一件大事——张骞由丝绸之路带回中国第一批音乐成果使汉代音乐成份开始发生新的变化。这一“历史事件”在当前的通史专著以及古代音乐史教科书中均被认作是“史实”，甚至有学者将其作为划分中国古代音乐史时期的标志。鉴于其史料出处的复杂性，近年来，曾有部分学者对该史料的真伪进行过考辨，但结论却大相径庭、莫衷一是，令人难以信服。基于这样的研究现状，笔者通过梳理前人的研究成果，并结合新发现的史料，对“张骞传胡乐”最早的记录文献——《古今注》以及“张骞传胡乐”史事的真伪进行考辨，认为今存《古今注》为伪书，“张骞传胡乐，李延年造新声”一事为伪史。

关键词： 张骞；李延年；鼓角；横吹；《古今注》

【作者单位】 上海音乐学院

前　言

文献记载：“横吹有双角，即胡乐也。汉博望侯张骞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唯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后汉以给边将。和帝时，万人将军得用之。魏、晋以来，二十八解不复具存，而世所用者有《黄鹄》等十曲。其辞后亡。又有《关山月》等八曲，后世之所加也。”①

横吹，作为中国音乐历史上一个专有名词，其含义有三：（1）泛指横笛等横执演奏的单管边棱类乐器。（2）乐府曲名。其作品主要应用于古代军乐中，目前大量乐府诗横吹曲见载于南宋郭茂倩《乐府诗集》。（3）演奏横吹乐的乐队形式，即古代行军时在马上演奏的乐队。《乐府诗集》曾记载该乐队的演奏乐器主要使用鼓和角。横吹与鼓吹共同构成了我国古代军乐鼓吹乐的主体②。

有关横吹乐的起源，古今学者大多认为张骞出使西域带回《摩诃兜勒》，李延年据此造“新声二十八解”后逐渐形成，其史料最早见载于西晋崔豹《古今注》“横吹”条目。隋唐以后的历代文献较崔豹《古今注》虽文字表述略有不同，但其大意相近，可见古代各方史家对“张骞传胡乐，李延年造新声”一说是莫不认同，深信不疑的。

1934年仲铎《张骞得胡曲李延年造新声辨伪》一文通过八条辨伪理由认为“张骞得胡曲，李延年造新声”这一史料为后人伪撰，乃南朝陈沙门智匠《古今乐录》之妄说，同时对“张骞得胡曲，延年造新声”的真实性提出质疑。1988年阴法鲁《中国古代音乐史料杂记三则》也肯定了仲铎的观

① 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47册第201—202页。

② 鼓吹乐有广义、狭义之分。两种鼓吹乐概念之间的关系以及鼓吹乐与横吹乐之间关系详见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册）》，人民音乐出版社，1982，第110页。

点，认为今本崔豹《古今注》内容杂乱，疑是后人根据残本缀辑有关史料而成，应为伪书。

对于仲铎、阴法鲁先生的观点，郑祖襄在其《〈古今注〉“横吹曲”史料真伪谈》一文进行了反驳。郑氏文章重新对“张骞得胡曲，延年造新声”的史料“源点”——西晋崔豹《古今注》的真伪进行了考证。文章通过引用195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古今注·中华古今注·苏氏演义》的重版说明以及对《晋书·乐志》相关史料重新句读、对唐宋以来保存下来的乐府诗辞等文献进行梳理考证，认为今本《古今注》并非伪书，李延年所造“二十八解”也确为汉代作品。但细读郑先生文章，笔者认为该文的部分考证方法及理由值得商榷：

1,郑文将仲铎的八条辨伪理由概括为四点并在文章中逐一驳解，但对仲铎、阴法鲁所提出的历史文献中的“魏晋”问题、音乐结构术语“解”的出现年代等关键性辨伪理由避而不谈，其驳斥观点若有避重就轻之嫌。

2，郑氏文章总结《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观点并引用商务印书馆的考证结论来说明过去对《古今注》真伪的争论。但文章未对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作任何矛盾解析，也未对历史文献《古今注》作辨伪考证，仅凭商务印书馆“重版说明”一家之言便得出该书为真本的结论，并以此结论做为探论“张骞使西域传胡乐”为非伪史的基点和前提。同时将无法做为文献真伪考证依据的常用词语工具书《辞海·文学分册》的相关文字作为考证《古今注》为真本的旁证材料。文章辨伪文字及方法确值商榷。

3，郑文驳仲铎“古今注音乐篇末之文系后人羼入”观点时认为“……但《古今乐录》晚于《古今注》，也有可能有同样的记载。此外，《后汉书》李贤注……，也是有可能把《古今注》错写成《古今乐录》。”郑先生以自己主观臆测出的若干“可能”作为论据，得出“仲文这条理由是站不住”的结论，实让人难以信服。

4，郑文依据隋唐时期诗人的几首诗词与《古今注》“汉横吹曲”同名推测“二十八解”本是汉代作品。笔者认为诗词做为一种被艺术化的文学体裁最多只能做为间接史料做旁证，而不能作为直接证据。更何况隋唐与西汉有近八百年之距，张籍、薛道横作为隋唐诗人怎可知道汉代横吹曲史事？

史籍中所载的“张骞传胡乐，李延年造新声”事件在今天音乐史学界看来是音乐史上的一件大事，毕竟胡曲《摩诃兜勒》是张骞由丝绸之路带回中国的第一批音乐成果，使得汉代音乐成分开始发生新的变化，所以有学者认为张骞传胡乐延年造新声是“最早的有关民族音乐之间进行交流的较为具体的记载”①，更有甚者将该事件作为划分中国古代音乐史时期的标志。“张骞传胡乐，延年造新声”作为一种随时间流逝而烟消泯灭的历史文化现象而被传载了两千多年。历史上的“胡曲”、“新声”究竟有无？今天的我们似乎只能通过先人留下的残短的历史文迹去探寻两千年前史事的真伪。

总结前人对“张骞传胡曲，延年造新声”史料真伪问题的研究考证，我们不难发现学者们研究结论矛盾的焦点主要有以下两方面：（1）该史事的最早记录文献——崔豹《古今注》是魏晋以来流传下来的文字真本还是后人剿袭他书而成的伪书。（2）古代文献所记载“胡乐”、“新声”事件的史料内容可信性有多少，史料表述有无疑点，是否可以与目前出土的实物相印证。

基于上述两点矛盾焦点，本文从历史文献所载的相关史料入手，探寻胡曲、新声之真伪。

① 张仁镜：《张骞出使西域的历史贡献》，载《汉中师院学报》，1986年第2期。

《古今注》真伪辨

中国历史学宗师梁启超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曾提到："辨伪法，先辨伪书，次辨伪事"①。依此史学研究原则，若考辨张骞出使西域带回《摩诃兜勒》及李延年创"新声二十八解"史事的真伪，首先应考证相关史事文献记载书目的真伪。

张骞出使西域带回《摩诃兜勒》，李延年造"新声二十八解"之事最早见载于晋人崔豹《古今注》：②

"横吹，胡乐也，张博望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唯得摩诃兜勒二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后汉以给边将军，和帝时，万人将军得用之。魏晋以来，二十八解不复具存。世用者，黄鹤、陇头、出关、入关、出塞、入塞、折杨柳、黄华子、赤之阳、望行人十曲。"

关于今本《古今注》真伪问题，上海商务印书馆1956年在重印《古今注》时，对《古今注》的真伪做了考证。《重印说明》认为：今传宋刻本《古今注》三卷和《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记载相符，《直斋书录解题》和《玉海》引《中兴书目》均是将《古今注》和《中华古今注》二书并列，陈振孙并说后书是推广前书而作，《中华古今注》是推广增益了《古今注》的内容。由此认定今本《古今注》非伪书，承认了该书的史料价值。

对于《重印说名》的观点笔者不敢苟同，因为马缟在《中华古今注》序言中已经提到："昔崔豹《古今注》博识虽广，殆有阙文，洎乎广初，莫之闻见"③，说明五代马缟作《中华古今注》序言时就已经知道崔豹《古今注》内容部分亡轶，所以才会"添其注，以释其义，目之为《中华古今注》勒成三卷"④。《重印说明》的考证依据，只能证明宋代是否有《古今注》一书，并不能确定该书是真本还是后世造的伪书，即便判断出伪书也不能判定该书是全伪还是部分伪。所以，《重印说明》的理由是站不住的。

清朝四库馆臣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也对《古今注》真伪进行了考证。《提要》认为《太平御览》所引书名，有豹书而无缟书，《文献通考·杂家类》又只有缟书而无豹书。《古今注》早已亡轶，今本崔豹《古今注》是后人摭拾后唐马缟《中华古今注》里魏以前的事编辑而成，而《中华古今注》又是抄袭了唐苏鹗《苏氏演义》，所以今本西晋崔豹《古今注》实为伪书。笔者认为《四库提要》在对豹书真伪的理由是有瑕疵的，原因有二：(1)《文献通考·杂家类》记载"《中华古今注》……後唐太学博士马缟撰。盖惟广崔豹之书也。"⑤从文字所述中，可知《文献通考》作者是承认曾有崔豹《古今注》一书存世，并且也认同了《中华古今注》剿袭了崔豹《古今注》。(2) 崔豹《古今注》虽未在《文献通考·杂家类》列出，但在该书的《王礼考》、《乐考》中多次提及崔豹《古今注》，如：

---

① 清·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第4130页。

② 晋·崔豹：《古今注》，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50册，第106页。另，晋人崔豹《古今注》一书，曾有文献记载"豹书久亡"。但据王朝客考证，至今仍有崇祯二年影明抄本、明抄本，卢文弨校本、明刊本、芝秀堂、明刻本、明《顾氏文房小说》本等六种版本流传，由于各种版本无明显文字差异，顾本文仅选用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所收《古今注》。并将其简称为"今本《古今注》"。今本《古今注》真伪问题详见后文。

③ 五代·马缟：《中华古今注》，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50册第114页。

④ 同③

⑤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14册第544页。

“崔豹《古今注》曰：汉乐有黄门鼓吹，天子所以燕乐群臣，短箫铙歌鼓吹之，常亦以赐有功诸侯也。”①

显然，四库馆臣在考证《古今注》真伪问题时并未通查《文献通考》全书，而仅查以《文献通考·杂家类》未刊列出《古今注》一书便断章取义认为《文献通考》未提豹书。该理由实为欠妥。

清朝四库馆臣与商务印书馆对同一史籍真伪问题结论相悖，孰是孰非？

崔豹生活于西晋惠帝时期，其所著的《古今注》成书距今已有1700年之遥，年代久远。由于“书愈古者，伪品愈多”②，所以崔豹所作《古今注》是真是伪确值考证。笔者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并发掘其它相关史料，对《古今注》横吹史料源流重新进行考辨认为：历史上曾存有两个版本的《古今注》。今本崔豹《古今注》是后人摭拾后唐马缟《中华古今注》里魏以前的事而成的伪书。《中华古今注》是根据西晋崔豹《古今注》残本添注释义而成。西晋崔豹《古今注》最迟在唐朝其内容大部分已亡佚，目前仅有八个条目幸存于唐代行政法典《大唐六典》③中。今本《古今注》部分内容已非西晋崔豹《古今注》。现分别举《大唐六典》引〈古今注〉、《四库全书》辑录的今本《古今注》以及《中华古今注》“横吹”条目说明之④：

《大唐六典》所引〈古今注〉	《四库全书》辑录〈古今注〉	《四库全书》辑录〈中华古今注〉
汉代鼓角横吹者，始张骞使西域，得摩诃兜勒一曲。其后，李延年因之音为二十八解，若陇头、赤之杨、黄覃子、望行人、出关、入关、出塞、入塞之曲是也。	横吹，胡乐也，张博望入西域，传其法於西京，唯得摩诃兜勒二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后汉以给边将军，和帝时，万人将军得用之。魏晋以来，二十八解不复具存。世用者，黄鹤、陇头、出关、入关、出塞、入塞、折杨柳、黄华子、赤之阳、望行人十曲。	横吹，胡乐也。张博望入西域，传其法西京，唯得摩诃兜勒二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后汉以给边将。和帝时，万人将军用之。魏晋已来，二十八解不复具存。世用者，黄鹤、陇头、出关、入关、出塞、入塞、折杨柳、黄覃子、赤之阳、望行人一十四曲。

从上表所举条目可以看出，《四库全书》辑录的《古今注》“横吹”条目与马缟《中华古今注》文字相比几乎全同，与《大唐六典》引注的《古今注》“横吹”条目相比却大量扩充了史料的内容，增加了“传其法於西京”、“乘舆以为武乐”、“后汉以给边将，和帝时，万人将军得用之。”、“魏晋以来，二十八解不复具存”几句。所列横吹曲目也增加《黄鹄》、《折杨柳》二曲，扩为十曲。

历史文献中，“魏晋”一词的使用有两种含义：

①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13册第193页。除《文献通考·乐考》外，尚有《文献通考·王礼考》“崇德车”、“指南车”、“记里鼓车”等条目提及崔豹《古今注》一书。

② 清·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第4130页。

③ 唐·李林甫校注：《大唐六典》，中华书局，1991，第325页。另，今存于世的《大唐六典》刊本有南宋绍兴四年(1134)温州刊刻残本、明代有正德十年(1515)和嘉靖二十三年(1544)刻本、清代有嘉庆五年(1800)扫叶山房本、光绪二十一年(1895)广雅书局本、日本享保九年(1724)近卫家熙刻本、天保七年(1836)官刻本等多种刊本。各刊本对“横吹”相关史料记载略有不同。在诸多版本中，宋刻本虽为残本，但与本文相关的第十四卷保存完整，该刻本因刊刻时间据唐代时间最近，可信度最高而被史学界公认为《大唐六典》最佳版本。明刻本、清刻本因距唐时代较远，讹误相对较多。其中与本文相关的“李延年因之立为二十八解”一句，明显将“音”误写为“立”。顾本文以宋刻本《大唐六典》内容为史料依据。

④《大唐六典》所辑《古今注》条目分别为：“指南车”、“记里鼓”、“辟恶车”、“黄钺”、“豹尾车”、“华盖”、“雉尾扇”、“横吹”八条。这八条中大部分条目文字与今本《古今注》及《中华古今注》相关条目有所出入，尤以“指南车”与“横吹”两个条目与今本《古今注》文字差距明显。但由于篇幅所限，仅列举与本文有关的“横吹”条目。其它条目请参阅原文。

（1）专指春秋战国时期魏、晋这两个诸侯国。如：

二十三年，与魏晋战少梁，虏其将公孙痤。

——汉·司马迁《史记·秦本纪第五》

分野之说始见於春秋时，而详於汉志。……是时又未有所谓赵魏晋者。然后来占星者又却多验，殊不可晓。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二》

(2) 南北朝以后的大量历史文献使用“魏晋”一词用来泛指三国、东晋、西晋约200年的历史时段。如：

二汉及魏晋以加官从本官车服。

——房玄龄《晋书·志第十四》

崔豹是西晋惠帝时期人，曾做过西晋太子太傅。作为西晋中期的历史人物，绝不可能在其著作中使用“魏晋”二字。因此，“魏晋以来，二十八解不复具存”一句必是后人羼入。这一点，仲铎、阴法鲁在各自的文章中也有相关表述。

今本《古今注》所列举的“横吹曲”又增有《折杨柳》、《黄鹄》二曲。但笔者认为两汉时期尚未有《折杨柳》一曲。因为《宋书》对“折杨柳”曾有明确记载：

“太康末，京、洛始为“折杨柳”之歌，其曲始有兵革苦辛之词，终以禽获斩截之事。是时三杨贵盛而族灭，太后废黜而幽死。”

——梁·沈约《宋书·卷三十一》

这里的“太康”是西晋皇帝晋武帝司马炎的第三个年号（公元280年4月—289年）。很明显，《折杨柳》本非汉时曲，而是西晋武帝时期的乐曲，今本《古今注》关于横吹的记载是后人摭拾他书羼入而成的。

中国古代学者在纂书修史时，常善于引用前人所述文字并对其稍加增删，所修文字常有剿袭他文的痕迹。“二十四史”、“十通”等史书莫不有摭拾他书痕迹。“四库”本《古今注》内容与《大唐六典》辑录《古今注》“横吹”条目内容相差如此之巨，又与《中华古今注》如此一致，说明了从唐到宋至少曾出现过两个版本的《古今注》，《大唐六典》所辑录的《古今注》内容为西晋崔豹真本《古今注》，今本《古今注》的部分内容是后人伪作，当为伪书。就“横吹曲”条目而言，《大唐六典》所引的〈古今注〉“横吹曲”条目应当是西晋崔豹原文。

“张骞传胡乐，延年造新声”史事辨伪

“张骞使西域传胡乐，李延年造新声”一事最早见载于西晋崔豹《古今注》（辑于《大唐六典》），全文如下：

汉代鼓角横吹者，始张骞使西域，得摩诃兜勒一曲。其后，李延年因之音为二十八解，若

陇头水、赤之杨、黄覃子、望行人、出关、入关、出塞、入塞之曲是也。

通过该史料所述内容，可获得鼓角横吹发展的基本认识：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带回了胡曲《摩诃兜勒》，李延年根据所带回的胡曲，创作了“二十八解”，这些“新声”有《陇头水》等若干曲目。史料记载共涉及张骞传胡乐与李延年造新声两个史事，二者为因果关系。因此，笔者从这两个方面进行文献考证，以辨其真伪。

李延年是西汉著名的音乐家，曾入乐府并任协律都尉。与张骞同是汉武帝时期人，二人都因在各自的领域的卓越贡献而永载史册。

关于李延年入乐府的史料，有如下两则：

其春，既灭南越，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见。上善之，下公卿议，曰：“民间祠尚有鼓舞乐，今郊祀而无乐，岂称乎？”～～於是塞南越，祷祠太一、后土，始用乐舞，益召歌儿，作二十五弦及空侯琴瑟自此起。

——《史记·封禅书第六》

至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

——《汉书·礼乐志》

通过上述两则史料，可知李延年是在“祷祠太一”、“灭南越”、“祭后土”之后才入主乐府的。汉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立后土祠于汾阴脽上”，次年“立泰畤于甘泉”并攻南越。因此可以推断，李延年进入乐府的时间应不会早于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张骞卒于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而李延年在张骞死后两年才进入乐府，在进入乐府前，李延年不过是“坐法腐，给事狗中”的佞幸之人，即使张博望若真带回胡曲，地位卑微的李延年又是怎样得到《摩诃兜勒》并创“新声”的呢？因此，李延年得张骞带回的胡曲并创“新声”一事让人颇感费解。

《晋书·乐志》曾记载：“鼓，案《周礼》‘以鼗鼓鼓军事’。角，说者云，蚩尤氏师熔魅与黄帝战于琢鹿，帝乃始命吹角为龙鸣以御之。其后魏武北征乌丸，越沙漠而军士思归，于是减为中鸣，而尤更悲矣。”，其中“吹角为龙鸣”一说由于年代久远，内容又有神话传说之嫌，史料未必可信。但该史料反映了中国古代将鼓角二器应用于行军征战的史实。

除《晋书》外，南北朝以后的大量历史文献对“鼓角”都有着详细的记载，如：

“军城及野营行军在外，日出没时挝鼓千槌，三百三十三槌为一通；鼓音止，角音动，吹十二声为一叠；三角三鼓而昏明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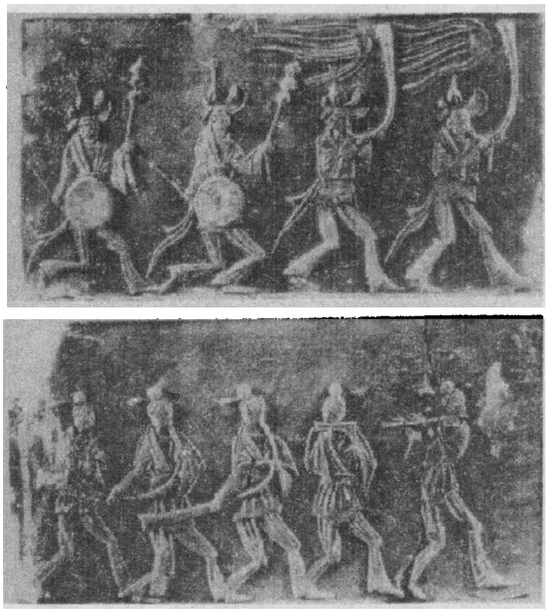
——《通典》引《卫公兵法》

“遂进军度高城岭，潜行，夜至狄道东南高山上，多举烽火，鸣鼓角”

——《三国志·魏书》

从文献记载来看，鼓、角二器是行军征战时广泛使用的器具。两种器物，虽同属乐器范畴，但在行军征战这种特殊的使用场合下，其音乐属性完全被弱化而仅是用以军队报时、警众或发号施令

的工具。值得注意的是，关于鼓角用于行军征战的所有文字记载及历史图像均出于魏晋以后（如下图），两汉及以前的文献却无任何记载。因此，两汉时期是否有鼓角横吹，确值怀疑。



（河南邓县南朝墓彩色鼓吹画像砖所绘的鼓角行军）①

“横吹”一词我国古代早已有所记载，如《尔雅·释乐》云：“篪，以竹为之，长尺四寸，围三分，一孔上出，一寸三分，名翘，横吹之”。此处所谓“横吹”当指手持乐器的演奏方式，并非“汉代鼓角横吹”。作为横吹曲之意则详见于郭茂倩《乐府诗集》②：

“横吹曲，其始亦谓之鼓吹，马上奏之，盖军中之乐也。北狄诸国，皆马上作乐，故自汉已来，北狄乐总归鼓吹署。其后分为二部，有箫茄者为鼓吹，用之朝会、道路，亦以给赐。汉武帝时，南越七郡，皆给鼓吹是也。有鼓角者为横吹，用之军中，马上所奏者是也。……横吹有双角，即胡乐也。汉博望侯张骞入西域，传其法於西京，唯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后汉以给边将，和帝时万人将军得用之。魏、晋以来，二十八解不复具存，而世所用者有《黄鹤》等十曲。”其辞后亡。又有《关山月》等八曲，后世之所加也……”

从《乐府诗集》“横吹曲”条目可获得如下两点认识：（1）横吹乐最早叫鼓吹乐，由西域传入。（2）横吹乐使用乐器鼓、角，且横吹乐在马上演奏并用于军队。

鼓吹，汉代已经出现。《后汉书·礼仪志》注引蔡邕《礼乐志》说：“汉乐四品：一曰太予乐，典郊庙、上陵、殿诸食举之乐。……二曰周颂雅乐，典辟雍、飨射、六宗、社稷之乐。……三曰黄门鼓吹，天子所以宴乐群臣。……其短箫饶歌，军乐也。……”。但汉代的文献载有“鼓吹”确无“横吹”。郭茂倩依据什么材料认为汉代有横吹呢？对此，郑祖襄先生解释认为“郭茂倩可能是依据《隋书·音乐志》《新唐书·仪卫志》《旧唐书·音乐志》的鼓吹的记载推测而来。” 郑先生对郭茂倩史料来源的臆测让人难以信服。何况隋唐距西汉有八百年之距，怎可以据隋唐之规来推西汉之制？

①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中国音乐史图鉴》，人民音乐出版社，1988，第52页。
② 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47册第201—202页。

《乐府诗集》说“有鼓角者为横吹，用之军中，马上所奏”，联系其《古今注》“汉代鼓角横吹者”记载，我们可知张骞所传横吹是使用“鼓角”奏于军乐。近年来，我国出土了大量汉代画像，部分画像反映了西汉中期到东汉末年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不同地域的音乐文化生活，为研究汉代音乐提供了详实可信的证据。李荣有先生曾对汉代画像中的音乐画像做过统计，在其所列举的19例两汉画像各种不同乐队编制中，乐器类型涉及打击乐器、吹管乐器、弹弦乐器，其中不乏钟、磬等用于宫廷雅乐的金石乐器，但却几乎没有西域乐器的使用①，说明整个两汉时期，中原音乐文化几乎没有受到西域音乐文化的影响。在所有已发现的两汉代画像中，涉及鼓吹、骑吹等军乐演奏的画像共39幅，所绘乐器有建鼓、提鼓排箫、笳、鼗、竽、埙、箫、铙等多种乐器。在所有乐器中，除一幅东汉画像绘有若似北方少数民族的乐器笳外，其余全部为汉民族文化乐器（如下表格）。这说明在整个两汉时期，军中所用鼓吹、骑吹的汉民族成份占绝对的主体地位。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从部分东汉画像的鼓吹、骑吹乐队组成看，并没有使用角，更何谈“鼓角并用”的横吹乐了。《乐府诗集》所说“双角”以及《晋书》所说的“胡角”应是魏晋时期才应用于横吹乐的胡乐器，这一点从邓县南朝墓彩色鼓吹画像砖的图像得以证实：两幅图像均各有两人吹角，即文献中所谓“双角”。因所吹奏的角形体长大，并非中原固有乐器，应为“胡角”。所以，郑祖襄先生标点的《晋书》“胡角者，本以应胡笳之声，后渐用之。横吹有双角，即胡乐也”当不无道理。

综上所述，两汉时期的军乐中绝不可能使用“鼓角横吹”，因此崔豹《古今注》所谓“汉代鼓角横吹者”为伪史。

类别	图例	乐器	乐队编制	出土地点	年代
鼓吹乐	《徐州石》图227	5	建鼓1、排箫1、竽1、瑟1、笛1	徐州沛县	东汉
鼓吹乐	《南阳石》图470	5	建鼓1、排箫2、鼗鼓2	南阳市	东汉
鼓吹乐	《南阳石》图169	6	建鼓1、排箫2、鼗鼓2、钲1	南阳王庄	东汉
鼓吹乐	《南阳石》图229	8	建鼓1、排箫2、鼗鼓2、钲1、埙1、小鼓1	南阳市七孔桥	东汉
鼓吹乐	《山东石》图173	7	建鼓1、排箫2、鼗鼓1、笙1、埙1、小鼓1	曲阜县于家庄	东汉
骑吹乐	《川·大系》图2.3.11	6	树鼓1、排箫2、笳2、钲1	成都青杠坡	东汉

张骞先后两次奉汉武帝派遣出使西域，史称“张骞凿空”。伴随着这划时代的政治外交活动，经济、文化上的交往也逐渐频繁，中原与西域的互往形成了举世的“丝绸之路”。张骞也因这划时代的外交活动被封博望侯，其活动事迹也被各朝史家传注。在所有史家的著述中，以《史记》最为可信，毕竟《史记》作者司马迁与张骞同是汉武帝时期人，“最先最近之史料则最可信，此固原则也”。

① 由于汉画像年代久远，部分画像由于自然风化等原因无法准确辨认。其中南阳石图479有一乐器是否为竖箜篌尚存争议，有待考证。另，《中国音乐史图鉴》认为山东肥城孝堂山汉画像有一乐器是“笳”或“角”。但是，笔者认为该画像由于图像剥落痕迹严重，难以确定该画像中的器物为“笳”或“角”，也有待考证。

除此之外，东汉班固《汉书》也是研究张骞出使西域活动的重要文献。细读《史记》、《汉书》，两书均详细记载了张骞出使西域的时间、出使路线，甚至西域葡萄、苜蓿等植物出入中原，安息使臣献大鸟卵及幻人之事都被详细记录，若张骞自西域带回《摩诃兜勒》对后世鼓吹乐产生如此大的影响，作为同朝的司马迁以及时代接近的班固不会不记录。然而，“张骞凿空”后四百年内，从未有过文字记录。笔者认为有两种可能：(1) 张骞出使西域跟本没有带回《摩诃兜勒》，后世四百年内自然无人记载。“张骞带胡曲，李延年创新声”的记载乃魏晋之人伪撰。(2) 张骞确实传胡乐并被李延年造新声后应用于军队，得以发展成为汉代横吹曲，只是这一事件并未被各史家重视，因此没有见诸文献。但正如前文已述，目前汉代的史料中不光没有张骞传胡乐的记载，甚至两汉三国四百多年内，连鼓角、横吹的记载也是文字全无，而且目前所出土的不同地域的汉代大量画像也无任何可以佐证的信息。因此，完全可以肯定，第二种可能是不成立的。张骞出使西域并未带回胡曲《摩诃兜勒》，“张骞传胡乐，李延年造新声”一说必是伪史。

通过以上对“张骞传胡乐，李延年创新声”相关史料的分析、考辨，我们得知，今本《古今注》是后人根据残本剿袭它书而成的伪书，汉代也本无鼓角横吹，“张骞传胡乐，李延年造新声”一事当为伪史。事实上，在浩繁的史籍文献中，类似的伪史、伪事并不少见。正因如此，在音乐史研究过程中应以批判的眼光去审视历史遗留下来的文献，对相关文献考辨真伪并去伪存真，使学术成果更符合历史学求真的根本原则。